



第一章

重新審視 香港經濟 獨特性與優勢

香港的經濟獨特性與優勢這一問題，在回歸20年這個時間被重新提出或多或少會令人感到詫異，但卻又合乎情理。近年來，香港周邊地區超速發展，令香港人多年來的經濟優越感一次又一次受到衝擊。眼看着過去由香港佔據引領地位的內地，在經濟上遠超香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，港人內心對保持自身的獨特性與優勢之焦慮油然而生，加上目前香港社會亂象叢生，更平添了港人對香港能否持續繁榮發展的疑慮。今年正值是香港回歸20周年，在這種疑慮不斷累積的情況下，對香港來說，清晰定義其國際上的優勢及動向，自身與外部世界的獨特關係，從而確立重新出發的戰略，是提升香港優勢的關鍵；而對中央政府而言，從國內外政治與經濟大變局的高度，重新審視香港經濟獨特性與優勢的內容、動態變化和走向，作出理性判斷和客觀的分析，以達致心中有數、政策有據，則是順利貫徹「一國兩制」，保持香港持續穩定繁榮的根本應對之策。

馬克思（Karl Marx）在《資本論》（*Capital*）中，把經濟進程當作是自然史的過程來觀察，即是把經濟現象與因果關係，當作是時間和內在規律的變數。如果時間退回到5-10年前，甚至是更早的時期，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可以說是絕對無人質疑的議題。1990年代中期，即香港回歸中國前期，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正處於全盛時期，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不但推動經濟，還讓中國深深捲入這股全球化浪潮之中，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主要部分。「中國製造，美國消費」的全球化現象是中國經濟崛起的主因之一，讓中國成功建構市場經濟體系，躋身世界十大經濟體之列。地處中國的香港擔當與世界市場聯繫的仲介角色，其獨特性對中國建構市場經濟體系、成為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，亦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。同時，香港也從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。因此，香港這個位於中國邊陲地區、長期寂寂無聞的殖民海島開始受到世人關注。香港優勢不僅得到全球認可，其成功經驗更為很多學者津津樂道，而且得到當時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導意識——新自由主義奉行者的青睞。

1995年，哈佛大學學者恩萊特（Michael J. Enright）等開始編寫《香港優勢》（*Hong Kong Advantage*），並於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出版。這是一本最為集中闡述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的著作。作者在引論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：香港雖然受到各界廣泛的談論，然而卻未曾獲得普遍的了解。此書的目的在於認識清楚「是甚麼使香港如此獨特」，並讓我們知道「維持並發展香港的特性、『香港的優勢』，將可使香港的未來和它的過去一樣，令人讚歎」。¹此書的出版為香港的獨特性與優勢定下基調，是其後討論與研究香港優勢的範本。

歸納《香港優勢》的觀點：首先，書中指出香港具有「一個獨特的經濟體系」，「不但令香港成為一個橋樑或者一條通道，也使它成為世界經濟活動的統籌兼協調者」。²而且，香港經濟體系的特點是「開放、具有國際視野，以及靈活性」。³與此同時，香港經濟體系還有一些「獨特組合」，成為香港經濟獨特性的主要表現。這就是政府和商界之間、本地和海外企業之

1. 恩萊特、司各特、杜大偉，曾憲冠（譯）（1999）。《香港優勢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3頁。

2. 同上註，2頁。

3. 同上註，25頁。



香港擁有獨特的優勢，是中國連接世界市場的橋樑。

間、企業家企業和管理人企業之間、長遠投資和短線活動之間的平衡關係。⁴由此，書中總結出「香港的經濟體系和種種獨特組合是香港優勢的來源」。⁵其次，按照本書的論證，香港優勢主要在於商業貿易、航運、專業服務和金融業的高度國際化，與世界各地均有緊密的聯繫。相反，製造業是閉合型的經濟體系，並非香港的發展優勢，故香港作為服務型經濟體應保持對外開放，以提升其在全球的地位。

1990年代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、新自由主義盛極一時的最好年代，香港優勢此時亦達至頂峰。然而，香港卻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以及隨後的2007-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，均對其經濟造成極大衝擊，更暴露了香港經濟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脆弱性。尤其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，美國主導的負債消費全

4. 恩萊特、司各特、杜大偉，曾憲冠（譯）（1999）。《香港優勢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29頁。

5. 同上註，115頁。

球化難以為繼，全球經濟踏入重大的歷史性轉型期。新自由主義推崇自由放任的經濟，導致過度金融化的現象出現，就是這種「不受限制」資本主義的弊端，使其經濟、社會與政治矛盾全面激化。因此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進入一個需要重新反思的時期；而中國則開始經濟社會的全面升級轉型，從全球製造踏進經濟崛起的另一個全新階段。金融海嘯時期，世界經濟格局經過重大調整和變化，使香港在內地城市持續發展壯大。尤其在珠三角地區城市經濟功能對香港功能的逐步替代進程中，香港擁有的絕對優勢正在減弱，逐步轉變為相對優勢。《香港優勢》出版20年後，書中極為讚賞推崇的國際貿易中心、航運中心地位在近年均持續下降。形勢與事實變化之快，並沒有如《香港優勢》所預期般美好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很不幸的是香港近年來也被拖進無休止的政治爭議之中，整體社會未能在當下的世界經濟大變局裏，就如何應對香港優勢的變化取得共識，亦無法就此問題展開對話與探討。所以，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，香港經濟的獨特性與優勢這一問題不斷在社會發酵，卻無法取得方向性的結論。

本書指出所有國家或地區的優勢都是當時的歷史形勢和全球變局下，地緣政治與經濟變化的產物。正如沒有永久不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系一樣，世界上也沒有長久存在、亙古不變的地區經濟獨特性和優勢。香港的優勢和過往的經濟奇跡都出現在世界經濟變化「可一而不可再」的重大機遇時期。香港從享有地區的絕對優勢，逐步漸進為擁有相對優勢，隨着客觀局勢不斷演化，優勢將轉變成劣勢，預示着我們必須創造新優勢。因此，經濟優勢與劣勢是可以互換的，而一個經濟體本身就是優劣勢的組合。立足於此，我們才能認識「香港從過去承襲，作為《基本法》藍圖將延續至2047年的那一套，究竟有甚麼優點與缺點」。⁶

此外，任何地區的經濟優勢總是與周邊地區比較而存在的。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，自1842年因帝國主義強制的不平等條約，而成為英國殖民體系在遠東地區的條約港。隨後至1949年的百多年間，香港的經濟並沒有取得快速發展，自然也無人論及其經濟獨特性和優勢。相反，上海於1843年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，在發展、地位和優勢上均超越香港。這充分顯示出香港在1950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，作為「亞洲四小龍」的新興經

6. 顧汝德（2011）。《官商同謀——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》。香港：天窗出版社。67頁。



1842年開始，清政府先後與英國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，香港自此成為英國殖民體系在遠東地區的條約港。

濟體的發展奇跡；1980年後對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優勢，都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內地與香港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的產物，而非香港長期練就的獨門妙訣。正如《香港優勢》一書所指出的，「倘若沒有中日戰爭、中國內戰、四九年後中國大陸關閉三十年、冷戰、大躍進的災難和文革等變故，香港今天可能仍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次等轉口港。」⁷事實已經證明，正是中國過去長期閉關自守的狀態，才能夠突顯香港對內地的經濟獨特意義和優勢。隨着中國日益開放、更深地融入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之中，香港對內地的獨特性則愈來愈小，經濟優勢也隨之下降。人們把香港的獨特性和優勢看作是持久不變、不會消滅的絕對化看法，是既不客觀又不符合香港發展的事實。

香港優勢的初顯和最終建立，起步於1950年後的60年間，是當代世界經濟體系變化，尤其是資本積累向全球流動的產物。19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在東亞地區的工業化轉移，1970年代以

7. 恩萊特、司各特、杜大偉，曾憲冠（譯）（1999）。《香港優勢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4頁。

後新自由化資本主義推行的經濟全球化，以及中國面向市場化的改革浪潮，均是香港優勢逐步形成且大幅延伸的客觀條件。踏入2000年後，香港優勢隨着中國崛起，以及珠三角地區經濟持續升級而開始減弱。2007-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代表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，也預示着中國將從全球經濟增長的邊緣漸漸走向核心。這不僅衝擊了世界現代經濟體系，也標誌着香港在新自由化資本主義的階段，達致頂峰的優勢開始逆轉。在固有優勢的基礎上開發新的潛在優勢，創新與重振香港優勢刻不容緩。但是，過去形成優勢的香港經濟獨特性，本身就潛伏着導向香港劣勢的因素。在目前的形勢下，這種獨特性引發的劣勢正逐步浮現。實際上，經濟發展的獨特性既可造就優勢，也可轉化為劣勢。其決定性的因素在於當時的經濟形勢、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會促使這些特點偏向轉化為優勢，還是劣勢。

因此，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，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與反思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性，以及香港優勢在不同時期，尤其是回歸後的展開、演化和原因，以得出客觀的結論，並正視目前香港優勢仍然存在，但卻慢慢減弱這個趨勢。面對當下全球新技術革命、世界經濟體系大變局，目前香港經濟的發展，不僅要從「世界所趨，國家所需，香港所長」的結合點，提出香港未來發展需要着重鞏固既有優勢和培養新優勢；也要從「世界所趨、內地所長、香港所短與所需」出發，利用「一國兩制」的優勢，通過深化與內地的合作，根除劣勢及對舊有路徑的依賴，發展出全新的經濟功能和優勢，以提升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。